

清末

小说的生产与传播

李彦东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清末小说的生产与传播

李彦东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小说的生产与传播/李彦东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12

ISBN978-7-5034-2348-2

I. 清… II. 李… III. 古典小说—小说史—中国—清后期 IV. 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629 号

责任编辑:高 芳 封面设计:李 晖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印 刷:北京市登峰印刷厂

装 订:北京市登峰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32 开

印 张:6.5 字数:175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3.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序论·····	1
一、从何说起·····	1
二、报刊·····	8
三、小说·····	15
石印小说小论·····	22
石印:阅读还是收藏·····	23
石印小说的图文策略·····	26
上海背景与文化消费·····	30
《绣像小说》中的“绣像”·····	33
新闻生产中的小说传统·····	41
都市记忆与历史情怀:王韬对《聊斋志异》的借用·····	43
小说文本与新闻表达的同位:邹弢的模仿意义·····	58
申报馆与《儒林外史》·····	76
一、报纸广告与小说传播·····	77
二、新闻报道与写实笔法·····	80
三、申报馆与张文虎·····	85
“刊里书外”:重论《海上花列传》的风格及语言·····	90
一、写实与新闻·····	91

二、方言与报刊·····	97
小报与“现形记”的兴起:李伯元及其《官场现形记》·····	103
李伯元与小报之关系·····	103
小报视野中的《官场现形记》·····	109
《老残游记》的三个维度·····	118
游记文体与小说叙事·····	119
作为政治小说的《老残游记》·····	127
《老残游记》与公案小说·····	135
《孽海花》:历史小说的“范式转移”·····	143
“风俗史”之东渐·····	144
赛金花·····	151
珠花式结构·····	157
《新小说》:类型与意识形态的交错·····	165
类型·····	168
政治小说·····	177
《小说林》:文化生产与小说批评·····	185
小说林社·····	187
小说理论·····	191
后记·····	203

序 论

“清末小说”是日本学者比较习惯使用的一个词汇。在中国，与之对应的有晚清小说、近代小说(中间一部分)或者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最前面的一部分)。尽管这些概念之间有相互包容和互相覆盖之处，但由于预设者的理论思路各有不同，由此便会带来深入研究细节上的差异。而与这三者相对应的，都有着相对完整的文学史观。对这三个概念略做分割，有助于明了本书使用“清末小说”的语境。

一、 从何说起

历史总需要有一个时间限定，这设定不见得是纯自然的时间。当社会事件或者文化变迁在某一点上成为某种常识时，该时间常常成为一种研究乃至一门学科的起讫点。在近代文学、晚清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三个概念上，其起点各不相同，而预设的思路也各有异趋。这三个概念的提出背景各不相同，最近二十年，最为风靡的莫过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的开始时间上溯至清末，其目的自然是为探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端及其可能缘由。在最初的构想中，钱理群等人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做“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过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

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过程”。^①在此后的数年间,此命题被从不同角度得以深化论述。而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内地学界对“现代性”问题的热烈讨论,再加上李欧梵和王德威等人著述的被译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已逐步被转化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此种转化其实是想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找出一条主流线索,并与西方的现代性相呼应或者相区别。如果说最初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是为了追求对统一模式、主流线索的反叛,那“现代性”的介入则逐步形成了一种作为整体的新主流话语。当边界模糊、歧义重重的“现代性”成为新主流后,其霸权性或垄断性是显而易见的。不少论著已先在地把“现代性”当做前提和“历史发展规律”,如此情形其实与此前存在很久的“近代文学”没有本质的区别。当“被压抑的现代性”成为主流后,“现代性”同样也会成为新压抑的根源所在。这里无意介入对整体性历史观念的细致厘清,但有必要将一些重要概念略做回顾,譬如“近代文学”和“晚清文学”。

“近代文学”一词本身就具有评估和反思的作用,这只能通过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比照方能显出其意义,而近代的意义正在于能将现代人声称的某种“必然性”在漫长的古代中寻找到的可能存在的延续。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里,我们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②这样的说法。这位宣称要推翻“三种文学”的人其实并非对古代完全不理睬,他同样希望从中能发现某些现代的资源,而“近代文学”便由此而设定。当然陈独秀与写作《白话文学史》的胡适一样,强调的是白话在中国文学中的价值,其概念也更偏于横向的并置,而较少问津于纵向上的对应。但二三十年代的学界确实已对“近代文学”的意涵进行了深入的探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页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② 《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第2页。

讨,并有相应论述和专著问世。胡适的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虽属给申报馆的“应制之作”,但将这一时期的大致轮廓都描绘了一番,并慧眼独具地将严复和林纾的翻译纳入了文学转型的环节当中。此后,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都是从文体演变的轨迹来探讨“近代文学”。陈子展显然深受五四文学观念的影响,在叙述上基本采取进化的模式,近代文学的过渡和终结意义在此书中在所多见。而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有意设置“古文学”和“新文学”的上下编,而上编的篇幅几乎是下编的两倍。如此迥乎寻常的写法也展示了近代文学特有的张力,许多在五四文学观念中被逐步边缘化的人物或文体在此仍旧享有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的研究已逐步将“近代文学”限定在戊戌前后至五四前后这一时间段上,但此时的历史叙述尚无明确的重心和主题。如果说胡适为新文学的由来提供了一种历史想象力,那主要是表现在语言运用和文体演变的层面,而钱基博对“古文学”的充分论述其实更像是为各种传统文体所书写的挽歌和衰亡史。他们更愿意从横断面上,用并置的方式谈论近代文学的诸多问题,这与他们在写作《白话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时注重连续性的态度大为不同。尽管这跟论题本身有关,但也跟两人对“现代”的理解差异有关,由此也造成了选择上的绝大差异。在胡适眼里,“活文学”是接近于启蒙的、通俗的乃至白话的,而钱基博所论述的“古文学”几乎都成了胡适所说“死文学”的范例。钱基博在写作《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是针对“执古”和“骛外”两种论史弊病,他其实是用“文苑传”的方式来写当代文人。历史时间的起讫在此时尚无一个特别明确而合法的理由。

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学文学史的编排使得“近代文学”的意涵和范畴再次成为一个问题。而政治史和革命史的思路此时被原样复制和传递给了文学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同样被看成了“近代文学”的明确时间。这一概念的过于专断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反帝反封建”的主线也经常与像“宋诗派”、“报刊文学”这些特

别的概念发生冲突。许多论者本不乏在专题中的深入研究,但总是需要将其对应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并借助于当时的“历史结论”,以此彰显略显虚妄的“时代精神”。当然,如此探讨近代文学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它将文学的外部研究拓展得很充分。阅读这一时期的近代文学史著,不仅能看到重大历史事件的跌宕起伏,还能看到从龚自珍到梁启超的思想史线索有趣的阐发。但略显遗憾的是,我们就是无法得知它与现代文学,尤其是与古代文学有何区别。这些阐发与同时期的台湾、美国的许多历史研究者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探讨中国历史的各种可能性,只不过言说和立论大为不同而已。文学研究固然可能或者非常有必要为历史叙事提供某些环节,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让历史叙述(而且是由特定理论推导出的、置于一尊的叙述)主宰文学史叙述。许多文学的内发性逻辑在“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中变得模糊不清了,它的存在仅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除了那些人所熟知的历史事件,它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其实没关系,更遑论独特性和过渡意义。

与“近代文学”相比,“晚清文学”的概念其实更复杂,也更加言人人殊。许多有鲜明学术个性的学者都更加喜欢使用“晚清”一词,因为其弹性要更大。言说“晚清”,既可以从戊戌前后说起,也可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说起,当然还可从更早时间说起。这都全凭研究者自己的切入角度。在以“晚清文学”的名义下,其实早已产生了一些迥异于“革命史观”的理路。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两方面。其一是“晚清文学”何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晚清文学”自然不能仅等同于晚清的文学。它与此前存在的“魏晋文学”、“唐宋文学”等的命名方式类似,但其意涵却由于古典与现代之别而截然成为一分水岭。文学中的“晚清”其实已不只是作家作品的累积性增长,也不单是某一文体、文类的勃兴或者名家辈出,它主要是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表达机制。此种机制由报刊的兴起而确立了新的表达途径和言说方式,由于时局国事的动荡而使报刊在吸引公众注意力上大显身手。由此表达机制所引发的焦虑感很容易成为整体性的,而对一些西方

学说、思想的介绍已将“现代”逐步摆在公众面前。文学作为“晚清”整体的一部分，它开始实践对晚清体验的种种定位甚或命名。文学中的“古今之争”并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有相同的意义，当某时段文学尚不能提供某种特别机制并表达该时段的整体性时，它仅是标签式的某时段文学而已。其二是“晚清文学”的评估问题，最易引发人们兴致的其实是它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而不是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于此便会出现对其价值的认定。如果按进化的模式或者“进步”的观念来衡量，不用研究也可说它有别于古典文学，但比“五四文学”稍逊，属于“进步的阶梯”。但如从其提供的各种表达资源以及开拓的众多表达方式而言，是否又得重估其价值。

阿英自然不是最早涉足“晚清文学”的学者。在他之前，钱基博、胡适等人的著述已对晚清文学有专论。但“晚清文学”作为一个有特殊意涵而又相对独立的整体被研究探讨，则自阿英开始。由他编辑的《晚清文学丛钞》系列确定了他心目中的晚清文学范围，这一范围至今仍是学界研究晚清文学的最通常涉及的范围。他撰著的《晚清文艺报刊史略》提供了新兴媒介环境中的文学生态，而他著名的《晚清小说史》则将晚清最具活力、最有代表的文体摆到了历史叙述的前台。由于这几部书的编选、撰著时期不一，内中存在不同侧重。“晚清”并没有明确的历史时间限定，譬如，在撰述《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是从申报馆开始；而在《晚清小说史》一书中，则主要是从“小说界革命”后说起。尽管没有明确的时间界定，但阿英所言说的“晚清文学”是有主流、有呼应、同时有相对明确和完善的叙述观念。《晚清小说史》最为完整地呈现了阿英的文学史观，这部著作的历史观念其实很简明，就是用社会变迁史的思路去寻找文学中的对应。在此书中，举凡在晚清有影响的运动、思潮或事件都进入到小说史的叙述当中。在十四章的篇幅中，其中有十章是在论述社会现实在小说中的反映（或是小说如何反映社会）。而剩下四章论述的却是小说理论、小说杂志及翻译小说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事后看来，似乎比另外十章更紧要。但这里并不是想说阿英的理论设计有何不妥，晚清小说的社会

性虽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方面,但肯定是特别重要而无法回避的一面。《晚清小说史》其实是对鲁迅和胡适观点的具体回应。鲁迅用“谴责小说”来概括清末小说,多少有点属于印象式的批评,而胡适强调《儒林外史》与晚清小说的关系则主要侧重形式层面的考虑。阿英开始用“社会性”这一思路来统一和重新整合鲁迅和胡适的观点。鲁迅对“谴责小说”的发现只是强调作者意图与社会现实在小说中产生的共振,而阿英则从作品、作者、读者以及小说作为启蒙工具四个方面构建晚清小说的全貌。胡适主要是从文体风格角度看待晚清小说,《儒林外史》也成为埋伏在旧传统中的先锋之作;而阿英则用新闻业与生活内容两方面去反驳,两者都是在社会生活发展的前提之下。《晚清小说史》的叙述方法不仅仅是反映论的具体展现,同时也是对梁启超等人小说理论的进一步提升。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几篇重要文章几乎成为了《晚清小说史》内发的理论渊源。阿英虽只在《晚清小说史》的首章中点到这三篇论文,但全书的选题、立意乃至谋篇布局都无不深受其影响。梁启超等人提出了小说影响社会的假设,而小说史家阿英则“反其道而行之”,从社会现实中寻找相应的小说。出于这一原因,一些著名小说被归结到“晚清社会概观”中,而其他的小说则被归入到重大事件的链条中,《文明小史》也由于更为全面地反映晚清社会而取代了《官场现形记》的位置。在小说与社会互为因果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进步的历史观”。进步的历史观念应该是十九世纪欧洲占据重要位置的历史叙述观念,严复、梁启超等人都深受此影响。在阿英的叙述中,“进步”是以反叛和对抗的姿态出现,章节命名中有“反华工禁约运动”、“反买办阶级”和“反迷信运动”,而在行文叙述中热衷于对社会矛盾、种族矛盾以及国家矛盾的发掘,甚至在一些小说演变的结论中也受此影响。譬如,在《晚清小说之末流》一章中,他将“吴语小说”的堕落完全归咎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半殖民地化的结果。

阿英的小说史论述自然颇多商榷之处,但如果明了其历史观念后,自不难看清其得失。与小说史家相比,作为选家的阿英对“晚清

文学”的影响可能要更为潜在和深远得多。由于阿英在晚清文学史料上的深厚功力,使得后继的晚清文学研究者常常是在他编选的材料中寻找问题,这不仅使新发现越来越少,也逐渐忽略了在这些材料背后的文学史观。阿英自己曾说过:“文选家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的观点,独特的眼光,其结果是必然的失败,选文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①卷帙浩繁的《晚清文学丛钞》不仅留下了许多罕见的晚清文学史料,也留下了阿英历史观念的细节展现。扼要简明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则展示了阿英对晚清文学环境的敏感,也展示了晚清文学的另一种叙述可能。但遗憾的是,阿英出于历史观念的影响,没有对这一环境深入地论述。《晚清文学丛钞》是以小说为主导,还包括《传奇杂剧卷》、《说唱文学卷》、《俄罗斯文学译文卷》、《域外文学译文卷》等。都于六十年代初刊行。这套丛钞作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的姊妹篇,它选择的标准大致与后者相类。《小说》共分4卷(小说理论与戏曲合为一卷),收录李宝嘉、吴沃尧、梁启超、黄小配、陈天华等17位作家的22种小说,反映了晚清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以及思想启蒙运动。《传奇杂剧卷》收录筱波山人、吴梅等人剧作28部,附卷录李慈铭等二人作品3种,大都是反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改良主义运动、民主革命运动以及妇女解放主题的传奇与杂剧。《说唱文学卷》为晚清通俗文学专卷,包括歌曲即时调与歌谣、弹词11种,戏文即地方戏18种,卷后补遗3种。所录作品也属于爱国、民主和科学启蒙的主题。这部丛书虽说是提供资料,但其客观效果是使《晚清小说史》的论述方式在小说以外的文体中产生作用。

阿英并非没有注意到晚清文学的不同层面,但“社会决定论”的思路使他不断地将报刊或者文学翻译等问题简化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钱理群等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引入“世界文学”。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对前此文学史语境的一个缩小。当阿英等谈论近代文学时,似乎要将历史发展的动力都包

^① 阿英:《论文选》,《夜航集》,良友,1935年3月。

纳进去,但由于“社会”处于决定性的地位,便不可避免将很多的线索简化。相形之下,“世界文学”似乎只是谈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知识类别,而不牵涉此一类别与社会的直接联系。但实际上,“世界文学”在为文学内在性提供保障的前提下,也无形扩大了文学史的语境。不仅道德、政治这些话题仍被讨论,而且像美学意识、语言艺术等层面都被兼顾到了。“世界文学”这一略显理想化的概念在此次文学史语境的转换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社会决定论”的论述方式被一种理想化的假设所取代,多元化的论述也由此源源不断。晚清文学从何开始已逐步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成为现代中国经验的开端。

二、报 刊

从1815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后,近代化的报刊开始介入到中文表达中。尽管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中文报刊才在香港、上海等地逐步繁荣起来,但它却逐步为文学提供了另一种产生环境,或者说文学的生产工具产生了变化。文学环境的变迁本是相对模糊、经常也是长期的过程。但在清末这一特殊的阶段,报刊却以一种快速迅捷的方式开始渗透、介入到文学表达之中。在传统的书册经营之外,报刊已经成为清末最有特点、也是最有变数的文学表达媒介。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丰富了文学的表达方式,更可能在于反向影响到文学的诸范畴。

很多论者其实早就注意到晚清新闻业与文学传统之间的相互作用。钱基博在梁启超的报章文中看到了八股文的痕迹,而阿英则在《晚清小说史》中强调彼时小说的繁荣是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①但对于两者之间的深入联系,尤其是新闻业对文学的影响则常常只能是“点到为止”。这并不是说缺乏必要的材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页1,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料(像阿英本人曾编过《晚清文艺报刊述略》),而主要是很难突破由知识、学科分类所带来的限制,进而找不到恰当的理论角度。

在探究晚清报刊与文学的关系时,最容易生发的隔阂是缘自于新闻学与文学两门学科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新闻的认知虽在王韬、梁启超等晚清人士的文章中多有论及,但将其作为一门学科系统加以研究,可能还是要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一书开始。是书探究的是“中国报纸之发达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①但在古代报纸(以官报为主)与现代报纸之间的叙述方式并不一致。对于《邸报》、《京报》等古代报纸,戈公振主要是从文献学意义上进行考证辨析;而从外报介入到中国报业以后,戈氏方采用西方新闻学的观点对其加以分析论证。因此这部书虽统一在“报学”的名义之下,但其关注点和理论内涵却并非一以贯之。但自此书之后,中国新闻史却出于时代、连续性等多方面的考虑,往往从邸报,甚至更古老的、传说中的“断烂朝报”开始,一直叙述到现代、当代的报纸。在此过程中,中国报纸便是从很长时段的官报突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报刊。报纸与新闻之间的界限被完全模糊,而且报纸与传统书册经营之间的重大区别也很难再被认真思考。由于模糊了此种界限,很多新闻史家在面对晚清报刊时总是坦然地将其看作新闻报纸,然后用过于现代的眼光去看待这些报刊上的内容以及形式,而忽略了晚清报刊与西方新闻观念可能存在的差距。

在文学研究一面,对新闻业的重视可能存在下述一些方式。首先是将新闻与出版联系在一起,认为它加速了发行、传播的速度,给文学文本的产生提供了一种新型快捷的媒介方式。阿英的论著中多次强调这一点,但与文学相比,报刊总处在一个附庸地位。其次是报纸近“俗”的特点使得“报刊文学”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它复兴或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页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催生了许多新的表达,鲁湘元在《〈申报〉与中国近现代报刊文学》^①一文中用“报刊文学”的概念来重认报刊的重要作用,甚至重新规划晚清文学的进程。这两者立论相异,但都可算作文学的外部研究。也有论者从报刊发行机制上考察其对小说叙事的渗透,如陈平原的《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一文便可能是沟通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最有益尝试。不过由于该文的立论重心是在小说叙事一面,故而重视的主要是报刊刊载和发行的问题,而报刊对文学的影响其实远不止这些。譬如,报章文体与文学传统的相互渗透和借用,报刊特性对书册经营的冲击,晚清报人经常兼有的双重身份对其写作的影响等等。

新闻史家经常利用文学传统来描述不太清晰的报刊形式,而文学史家则习惯用文学社会学的方式看待报刊。但报刊不仅会有文学不太善于处理的时事内容,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形式,它并不必然依赖于文学传统,甚至它还经常扮演文学革命者的角色。报刊的形式自然不像文学体裁那样泾渭分明,它们常常是相互交错,杂乱无序。更为紧要的是,由于读报者对现代报刊的关注是出于了解新闻的心理动因,因此虽受其形式的影响,但关注的主要是其内容。但新闻报纸从一开始就不是只报道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闻,它也可能牵涉到一些不寻常的凡人小事的“杂闻”。而后者可能更具文体上的驰骋空间,也更可能与文学产生对话。罗兰·巴特曾将其归属于一种不可归类的类别,“它是一些未成形的新闻构成的无条理的废物;其本质是否定的,只在那种无名的、不属于任何已知类别(如政治、经济、战争、戏剧、科学等)的地方存在”。^② 这些“未成形的新闻”并非仅提供信息或知晓某一事件,它在心理学上实际也反映了“人类对生存以及

① 鲁湘元:《〈申报〉与中国近现代报刊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

② 转引自弗兰克·埃夫拉尔《杂闻与文学》页4,谈佳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个人在日常、社会秩序内部的地位的一种质疑。有些事件将平庸与例外混杂在一起,不仅向读者展示周围的世界,同时满足了读者贴近并理解控制人类生存的神秘法则的欲望。杂闻的功能并非提供信息或是知晓某一事件,而是满足广大公众的压抑本能以及最暴力的冲动。媒体对生活的曝光正巧对应了人们渴望探秘的好奇心”。^① 当十九世纪小报对城市犯罪竞相披露之时,侦探小说也逐渐盛行;而当二十世纪一些超现实主义着力图用非常规的方式表达梦想、疯狂和欲望时,杂闻再一次被以剪切或拼贴的方式出现在新文本中。这些事例都说明杂闻的形式逐步在文学文本中被进一步升华和固定,而新的文学形式之中已不可能回避杂闻表达带来的相关问题。

当我们将视线转回到中国近现代报刊的发展情况时,会发现尽管报刊的形态不一,但都开始逐步接受和认同西方的一些新闻观念,但在接受的同时也有了一些改变。西方近现代报纸在其问世之初便与书籍出版互不关联,按一般的说法,1566年出现于意大利的《缮报》(Notizie Scritte)为近代报纸的先驱,而1615年德国创办的《政府报》是近代报纸的滥觞,基本特点是搜集当代社会发生的各种事件,以一定时期印行,^②这与中国古代的官报极为相似。但在清末中国的报界,却存在着一种特别的情况,报纸、期刊和书籍的出版非但不泾渭分明,反而经常融为一体。这里面尤其以英国人美查所创办的申报馆为最。在申报馆这里,不仅能看到西方新闻观念是如何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更能看到如何与传统的书册经营进行竞争和相互借用。早期《申报》固然强调其作为新闻报纸的特性,但也不忘它是与书册出版的竞争者而出现,继起的《瀛寰琐记》等刊物则是调节报纸与书册各自优点的一个试验。这些期刊是纯然商业性的,它既

^① 弗兰克·埃夫拉尔:《杂闻与文学》页14—15,谈佳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② James Rogers(美):《世界报纸进化小史》,秦理斋译,引自黄炎培编《最近之五十年》第3页,申报馆1922。

非同人杂志的思考宣言,也不是出于启蒙宗教的考虑,而是将报纸的新闻特性同书册的耐读性结合在一起。只有在此情境下,“报”与“刊”的并称方是恰如其分的。此外,申报馆的书籍出版也不可低估,它不仅开始出版了一系列翻译书籍,还将一些古旧孤本进行翻刻重印。新鲜的铅印方式降低了书册的成本,而报刊代销的方式也使其销售遍及全国重要城市。申报馆没有套搬西方办报的经验,而是将报纸同刊物和书籍全面地结合在一起。应该说,申报馆将书、报和刊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并非唯一。曾朴等人开设的小说林社是将小说杂志同小说出版结合在一起的范例,而商务印书馆则不仅在书籍、刊物上大显身手,甚至还短期介入过电影业。尽管如此,申报馆却可能是唯一将新闻生产的思路放在其产业规划的中心位置。而像小说林着意于小说,商务印书馆则更侧重启蒙读物的生产。

如果首先将报、刊乃至书籍出版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那有关新闻业的具体影响则可能更为明晰一些。因为此时新闻不再等同于报刊,而报纸的部分因素早就有着朝杂志、刊物甚至书籍过渡的可能性。像《瀛寰琐记》上刊载的翻译小说《听夕闲谈》不久就为申报馆作为单行本而出版;而《点石斋画报》后幅的“奇书”刊载本来就是朝着书册的方向发展,鲁迅就曾从《点石斋画报》上收集过王韬的《淞隐漫录》。这是从两者的物体界限而言。至于在形式上的相互渗透则更是不胜枚举。早期《申报》上经常存在的诗词唱和、猜谜行令常为一些正统新闻史家所“扼腕叹息”,但其实这些手段未尝不是复活了过去书册经营中的边缘文类。至于喜欢登载“可惊可愕之事”,用《聊斋》式的笔法记述杂闻则十足展示了文学传统在新型媒介中强大的生命力。当新闻业以报刊的方式影响和改变中国文学时,它首先是以接近或取代书册经营的整体方式来介入的,而并非是以新闻的事实性、时效性、通俗性等耳熟能详但空洞无物的概念来影响。

在目前的媒介研究中,至少有两种理论是跟晚清文学及报刊研究大有干系。一方面是鲍德里亚有关消费社会的假说,这一理论假设是将已成熟的媒介方式作为分析对象,它强调的主要是传媒所具